

关于生产关系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葛守昆 金 毅

生产关系,亦即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多年来不论是在经济学教学中,还是在经济研究中,以及改革开放实践中,生产关系问题都是人们认识模糊因而也重视不够的问题。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比较突出。我们认为,生产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必须加强研究,澄清是非,在思想上正本清源,迎接实践的挑战,从而对改革开放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一、《资本论》是生产关系论

马克思经济学说主要以《资本论》为代表,在国际上影响深远,自然人们对生产关系的认识也主要见之于《资本论》。但是,《资本论》卷帙浩瀚,容量很大,俨然经济学大百科全书。因此,人们也容易各取所需,莫衷一是。有的从生产力方面来认识,以为《资本论》研究的主要是生产力问题;有的从生产方式方面来认识,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是社会生产的具体方式,或者说是什么、以什么方式生产的问题;还有的则从商品生产甚至市场经济方面来认识,认为《资本论》揭示了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等。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究竟研究什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人们主观所能随心所欲解释的。我们不必拘泥于马、恩是否和在哪里对该书的研究对象给出明晰的定义,不必以虔诚的教条主义态度简单地论证某个观点的科学和正确,也不必生搬硬套地寻章摘句为自己的观点加以注释和说明。从方法论上,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亦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即是马恩研究《资本论》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目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资本论》对社会的影响、轰动和评价。唯有如此,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可靠性而不带任何偏见。

1. 《资本论》创作的动机和背景

一门科学主要对象是什么?首先要看其研究的目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他研究什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直言不讳,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及其历史暂时性,提出要改变这种生产关

系,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除了作为革命者,亲自参加革命实践,还作为科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不过,马克思献身科学的领域,开始研究的是法律、哲学和历史。那么,马克思后来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得很清楚,他说:“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这里说的是德国当时正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地主强占了过去一向为农民公共所享用的森林和草场,农民为生活所逼被迫去捡树枝,即所谓“盗窃”林木。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期间,在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中,他大胆挺身而出,保护倍受压迫而毫无权利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严厉地谴责地主的罪行,对省议会牺牲劳动群众来满足私利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但是,对于农民因被剥夺财产而出现所谓盗窃,马克思仅是凭着道义,从政治、国家和法的角度提出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批判普鲁士的反动制度,批判现存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并没有从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方面揭示出这种不平等的经济根源所在,因而缺少理论的真正力量。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头等作用,但他也感到自己这方面仅有的知识是欠缺的。因此,马克思决心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中去寻找法和国家的根源,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从而在理论上进入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另一方面,促成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因素,还由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马克思明确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认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只在理性的范围内而没有从人们经济利益关系上诅咒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就是在批判这些思潮时,他也深感自己由于缺少生产关系方面的知识,“善良的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批判”。他提出,要使社会主义建立在坚定稳固的科学基础之上,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就要到被有人蔑视的“市民社

会”中去寻找。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物质利益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在《莱茵报》被封闭以后，就潜心钻研政治经济学。

那时，马克思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首先接触到的是前人的思想材料和成果，其中主要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的对象也就不同。斯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刚刚取代封建主义的时期，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合理的，比封建主义“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斯密在他著名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公开声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为了尽速地发展生产，他精心研究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各种因素。为生产而生产则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所以，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他们并不愿也不敢触及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这样实质性的带爆炸性的问题。相反，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停滞不前甚至望而怯步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与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内部隐藏得很深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和暂时性，指出其终将被一种崭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如果不研究生产关系，也就没有马克思影响深远的《资本论》。

2. 《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影响

尽管《资本论》篇幅很长，体系庞大，许多学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哲学的、文学的，以及一般经济理论可谓应有尽有，但《资本论》的核心和精髓还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也并非是一般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包含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等的关系，只是这些关系是从属性的关系，在很少地方提及。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论》就是对于这种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

在逻辑上，马克思从商品分析的开始，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们来到市场，彼此作为不同的所有者，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但是由于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到劳动力市场向资本所有者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买卖即使是以等价交换的形式成交，可是买卖双方的关系、面貌、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如马克思所言：“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指出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并且从包括分配过程在内的总的生产过程来分析，剥削工人剩余

劳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资本的利息、利润以及土地所有者地租，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恩格斯说“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掩盖和抹煞剥削的观点，如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¹⁰，亚当·斯密的资本、土地、劳动“三位一体公式”等，指出“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但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¹¹。当然马克思也同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合理，不平等，也就不适应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提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将要被剥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的结论。

正是《资本论》对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即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揭示，才在整个社会历史上产生轰动性的影响。由此触动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利益关系，“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¹²《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¹³。恩格斯在为《资本论》写的书评中指出“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¹⁴还说无产阶级把《资本论》“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的最重要的论据”¹⁵。因为《资本论》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根源，所以“《资本论》在欧洲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¹⁶

完全可以想见，如果《资本论》研究的不是生产关系，不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一般的经济理论，一般的人与物的关系，一般的生产、流通、分配关系，研究一些纯粹属于“技术性”的经济问题，那么它就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二、彻底消除对生产关系的误解和偏见

将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马克思《资本论》是生产关系论，而且在于生产关系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必须把这种关系上升到理论和系统的高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基础科学，但是同时，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的认识，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误解，以及由误解产生的偏见，由此直接影响到这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甚至威胁到这门科学的生命，自然也抑制了生产关系科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1.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误解

人们对生产关系方面的误解，以及由误解产生的偏见，首先来自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并因此削弱了对生产关系研究的深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人们虽然批判了传统

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与此同时,在并未真正把握生产关系本质的情况下,错误地把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的失误归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从而急于否认、摆脱和放弃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甚至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视为“左”的思潮,这当然是经济理论中的冤假错案。我们认为,多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误,不仅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原因,而且恰恰相反,是没有始终坚持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和生产关系研究本身的落后、僵化和脱离实际。长期以来,我们争论不休的是政治经济学要不要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对怎样深入研究生产关系却很少涉及。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一是简单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比如所有制方面的、生产的、流通的、分配的、消费的,以及经济调节方面的,直到现在为止,政治经济学基本上仍停留于一些区别方面。这种区别并不能丰富生产关系研究的内容,相反堵塞了研究的道路。当然,这也是人们鄙薄生产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其次是先入为主地从公有制开始,先验地提出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平等互助合作的,规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收入是按劳分配的……。似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合理的,是天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们已经生活在天然合理的生产关系之中。但是在客观上,人们在现实中的对生产关系的感受与此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容易造成生产关系如同空中楼阁、充饥画饼,因而产生对生产关系的反感。其实,生产关系的先验规定与现实生产关系的差异,只能提醒人们要从现实中研究生产关系,去促进生产关系向理想方面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从书本上、结论上主观臆想地研究生产关系。当然这并不能作为否定或轻视生产关系的借口,由此产生不合常规的逆反心理。

其三是某些时期一味强调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人为夸大和歪曲人们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对立和矛盾,甚至把生产关系视为阶级关系,把生产关系矛盾视为阶级斗争,甚至将按劳分配“上升”到需要消除的“资产阶级权利”,甚至仇视商品货币等,从而导致人们厌恶生产关系研究。其实,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否是阶级关系,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性质。有史以来,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并非都是阶级关系,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比如在今天的环境里,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是阶级关系,而是非阶级关系,但谁都不敢由此而妄言说不需要研究。无端地把生产关系抽象为阶级关系,以致于因此排斥生产关系,当然只能是一种无知和偏见。

其四是借口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在政治经济学中把生产力研究放到首位。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他的历史责任和研究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和暂时性,所以没有着重研究生产力。”⁴⁷言下之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自然就要首先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则可以弃置一旁了。有些人还把我国一度时期极左思潮泛

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搞“穷过渡”、“一大二公”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过错。我们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个统一体,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起作用的。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只要研究生产力就行了,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生产关系的研究是生产力研究所根本不能代替的。这些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借口生产力的重要性而忽视、轻视甚至取代生产关系研究,同样表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认识有着很大的误解和很深的偏见。

关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日本生产力运动之父乡司浩平先生可谓是见解不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般人对提高生产力的认识就是“把新锐的武器替代迟钝的人工,产量由1000件增加到1200件,便算达到了目的。”从而把这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但当有人请教乡司浩平先生时,他则否定了上面这种机械性的说法,坚决地说,日本在战后“国破家亡,扶桑全土为联军占领,朝野上下彷徨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全国到处是分裂,是斗争,和平主义者跟军国主义者算老帐,……真所谓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在这样支离破碎一团糟的情况下,如何收拾河山,重谋宁静建国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⁴⁸

2. 对生产关系本身的误解和偏见

除了政治经济学对象之争产生对生产关系的误解与偏见之外,对生产关系本身的误解和偏见也是导致生产关系研究脱离现实、难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积极主张研究生产关系的部分学者,对于何谓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现实经济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许多问题也存而未论,悬而未决。近年来这方面的理论文献越来越少,寥若晨星,研究者形单影只,也充分反映了生产关系研究的不景气和萧条状况。

首先,人们在概念上的认识是一回事,但在具体描述和分析中则是另一回事。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尽管人们大都认为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撇开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谈,单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版教科书而言,学者们在具体研究和分析过程中,司空见惯的仍是脱离生产关系研究一般的经济过程,在经济理论中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生产关系,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现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不是大量地塞进部门经济学的内容,如金融信贷、商业流通等,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教材变成经济运行分析或微观经济学加宏观经济学的总汇,如讲企业的成本、价格、赢利,以及企业的资金循环和周转,还有总供给、总需求、国民收入、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就业量与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的分析等。当然,著者不是否认这些问题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但部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分析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把这些都纳入到生产关系中来,只会使生产关系研究偏离本质、迷失方向、磨灭锋芒,从而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事实上并不利于生产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只会葬送这

门科学。

其次,在对生产关系内涵的理解上,也相当肤浅。近些年来,似乎“四环节说”(主张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里阐述的经济运动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构成的理论来研究生产关系)占了上风。尽管一些编写者们在前言部分里也提到要研究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分配过程中的关系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但是,纵观全书,往往看到的仅是一般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到人们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与人们接触到的利益关系相距遥远,好象要么是些一般的经济学常识,要么就是一大堆空洞无物、泛泛无味的说教。如讲生产是起点,是前提,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四个环节不可分割联结在一起。讲生产是根据公有制来推论演绎生产的实质、目的,再就是分析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合理配置等问题;讲流通只是提出流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然后就讲资金的循环和周转,描述资金和商品的流通过程;讲分配则从再生产的性质开始,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讲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消费品的分配,应该说分配本身与人们的利益关系相当密切,可是由于脱离实际,人们在现实分配方面的矛盾及其解决远未揭示出来;讲消费则大量讲消费的结构、方式等技术性问题,更看不到有多少对人们相互关系的分析。其实,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十分丰富、十分生动的,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生产主体、流通主体、分配主体、消费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很多需要分析的矛盾和问题,可是在现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却十分苍白乏力,无论如何都难以满足人们对现实经济关系研究的要求和愿望,生产关系研究变成了一般的经济现象罗列,当然在许多重要问题和矛盾的分析方面就往往显得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抓不住本质,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

三、轻视生产关系理论研究的后果

生产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由于人们诸多的误解和偏见,使得生产关系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当然经济实践也缺乏相应的科学指导,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缺乏明确的方向,进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1. 理论上的后果

从理论上说,冷漠和轻视生产关系的直接后果,即是政治经济学至今尚未走出误区,一批经济学者(主要是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者)出乎偏狭的认识,似乎以为研究生产关系就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因而生产关系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人丧失了热情和积极性,队伍越来越小。许多本来研究生产关系问题的学者,纷纷转而研究生产力部门经济学或其它学科。当然,生产关系理论研究本身的“难关”、“禁区”,也可能令人望而却步,转而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避而远

之。综观生产关系研究的现状,不仅研究者寡,就其水平而言,也是一般,内容肤浅,枯燥无味,死气沉沉。不是简单的制度对比,就是在实证不能证实的前提下盲目规范,再就是一味作政策诠释,千万遍重复一种观点,而当政治和领导人观点重新变化时,又不得不跟着出现新的注解。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总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马克思当时出于研究的特殊目的,只要揭示出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就够了。但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以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目了然,或者只是简单地分析政府—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具体深入分析政府与部门、各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以及非经济部门、事业单位之间纵横交错、蛛丝密布的关系,特别是以人人为中心、为纽带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许多经济生活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难以得到科学的说明和解释。尽管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很少有人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论证和说明。必须承认,生产关系研究总的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也正因为如此,至今生产关系研究才很不深入和系统,生产关系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体系都不甚明确,生产关系科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

2. 实践上的后果

在实践上,忽视生产关系研究也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把生产关系等同于所有制(把所有制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把所有制形式的“升级”和“穷过渡”当作是生产关系的进步,认为全民优于集体、集体优于个体,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县联社,盲目“一大二公”,要求太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结果大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以致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得不实行农业大包干。但是对农民家庭拥有生产资料,引起所有制形式变化的情况,并未从生产关系方面作出解释。尤其是一批个体私营企业戴着假“集体”的红帽子,这也表明所有制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不明不白。

其次,生产力发展仍然受到生产关系的阻碍。按照人们通常的观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生产关系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生产力发展似乎是自身的科学组织问题。但是,消灭了剥削者和剥削制度,仅仅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步,或者说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诚然是重要的一步。问题的实质是在全体劳动者之间是否建立起能充分调动起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生产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在现实经济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一系列交往关系是否协调融洽,心情舒畅,真诚以待,从而焕发出内在的热情,认真负责,全力以赴去从事日常的劳动工作?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在调查中感到,至少有相当比例的人们都会亲身感受到自己积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未调动起来,自己的能力、潜力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并未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学者们经常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作预测,可是却鲜见由改革引致的对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分析,而恰恰在劳动者身上蕴藏的无比巨大

的能量和潜力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所在。说得再具体一点,这些年人们讨论较多的经济结构调整,工作应该说做了不少,但收效并不明显,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有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即生产力的调整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启动,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引起人们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如果忽视和绕过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连调整的主体、责任都不明确,经济结构调整就要遇到利益关系的障碍,使得调整很难功成圆满。当然,类似的事情还很多,这里无须赘述。

再次,轻视生产关系研究导致改革缺乏细致的生产关系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大了改革的难度和成本。改革作为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应该说,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同时,人们也感到,改革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还不够自觉,有的改革措施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缺少一定的系统性。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们现在利益观念已经相当强化,但行为不够规范,责任约束比较弱化,人们的责任、权力和利益还缺乏必要的对称性。还有,改革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尽管从长远来看,对人们都是有益的。可是从眼前来讲,首当其冲地,必然要触及到一部分人利害得失,必然使极少数人暂时失去部分既得利益,大多数人则将有所得益。如果把改革比作提供牛奶的奶牛,大家普遍受益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从改革实践来看,人们司空见惯的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总是要遇到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顽强的抗争,可我们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却相当薄弱,对改革必将产生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很少作出科学的说明解释,往往试图在不触及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推进改革,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尽管改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却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不是真正着眼于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留给人们的明显感觉,就是越改越难,最终还会动摇人们对改革的信念。

四、把生产关系科学从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的认识和研究基本上都还是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进步,再把生产关系置于政治经济学之中已经远远不合时宜。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无法涵盖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丰富内容。从某种意义上,再靠政治经济学揭示生产关系本质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生动表现,不仅容易引起很多的误解,更重要的,会形成某种束缚,有碍于生产关系本质内涵的揭示和研究。因此生产关系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从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1. 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关系并无必然联系

在经济学文献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的,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最出名的理论家安徒安·德·孟克列钦

(也有译为蒙克莱田, Montchretien, 1575-1621), 1615年,他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初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孟克列钦用这个术语主要跟历史上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学相区别。经济“Economy”是由希腊语“Oikonomia”词根派生的,而在最古老的亚里斯多德学说中,“Oikonomia”是“Oikos”(家庭)和“Nomos”(管理)两个词组成的,说明经济学是家庭管理的所谓“经济学”。但是,当孟克列钦把“政治经济学”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时候,经济学的实质就从“家”的管理发展到国家的管理。当然,这同当时重商主义主张政府保护政策是完全吻合的。

后来,“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由法国传入英国,并广泛流行起来,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到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学》,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西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等等,直到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问世,经济学一词才取代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流行开来。当然,即使在今天,西方国家也不乏有“政治经济学”新著问世。不过,人们比较一致的认识,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都不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或者基本上很少涉及生产关系。虽然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基本上都有“社会的”、“政治的”意思,如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是相等的。但跟生产关系都相距甚远。另外,围绕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大量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也研究了生产关系。不过他们的书名都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我们知道《资本论》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对以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因此恰恰也表明他们并不欣赏“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

从多年理论和实践来看,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误解。由于人们较多地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政策,也容易给人造成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加经济或“三分政治,七分经济”的印象。如果联系到我国“文革”时期政治经济学大量地充斥着阶级对立和斗争理论,充斥着无产阶级专政,更让人觉得“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政治化”。

“政治经济学”概念与生产关系没有内在联系,从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也能得到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现代政治经济学”,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依赖关系。布鲁斯·费赖在《现代政治经济学》(1978)一书中指出,“一个不能考虑到政治方面的经济科学,在今日依如往昔是不会令人满意的。经济学因此必须也是政治经济学,两者相辅相成,使传统的经济理论能够超越市场经济的狭隘、孤立范围而打进政治领域。”^[4]在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对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也表明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关系并无密切的联

系。范家骧教授解释一些西方学者称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时指出,现代经济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仅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是提不出任何有效“药方”的,因为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总是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等混合在一起,如果不将经济以外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孤立地讲经济、孤立地讲经济学是有缺点的,认识到经济不同政治结合、个人不同社会结合是有欠缺的。所以,“经济学”要回归到“政治经济学”当中。胡代光教授也指出,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只就经济论经济,任何经济问题都涉及到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制度这六大因素,所以西方学者才提出要回到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途径去。²⁰当然,在这里,我们感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范围还是十分明确的,把生产关系跟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实在是名不符实,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当然则事不成了。

2.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引起很多异义

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生产关系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有争议,许多悬而未决,难以定论。如所有制的性质问题,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因素,尽管比重不同,但“公有”、“私有”是否具有截然对立的性质,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还仍然不得其解。再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究竟何谓“公平”,是否收入的平等就是公平?公平与效率是否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另外,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一对基本矛盾究竟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力的水平是否就是生产工具、生产总量的程度和水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又是构成怎样的有机联系?这个问题基本上只在教科书的“绪言”或“前言”中提及,但在正文中却很少分析,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仍然是个谜。还有分配问题、消费问题,以及生产的内容,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争等等。我们认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研究生产关系,往往不是出现政治化的倾向,如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阶级性,就是或者从一般纯经济学的角度淡化生产关系,把政治经济学变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财政经济学等等学科的内容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当然这也使得生产关系的许多重要问题得不到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分析,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始终得不到本质的揭示,找不到科学真谛,成为不明不白的老问题。

3. 对生产关系进行充分展开地研究也必须将其从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的研究还是很充分的。一些本质的东西没有真正得到科学的揭示,一系列表现形式没有充分展开。比如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究竟应该构成什么样的经济关系,现实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关系,许多方面都需要分析和研究。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服从于研究的目的,他

只要揭示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揭示出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就够了。西方经济学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与这个社会相联系的法律制度已相当具体。在这个前提下,生产关系需要研究的新内容也不可能太多。但是我国在今天,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实质上也是人们生产关系发生深刻、迅速变化的时期。在这个过渡阶段,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传统生产关系的弊端,提出改革生产关系的方法、步骤、内容等,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我们从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关系中,揭示出有规律性的东西。要对客观存在的每一种、每一个方面的生产关系作认真细致的分析。比如一个企业内部,劳动者在进入、分工、分配等方面,应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其不合理性及弊端何在,需要采取什么改革办法,来促进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和协调,以焕发劳动者的热情,激发他们的活力,同时规范他们的行为?特别是在许多有关生产关系本质尚未揭示,方法尚不成熟、体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确实需要做太多的分析和研究,生产关系所包含的内容应该一览无遗地作充分展开。

显然,如果把生产关系置于政治经济学之中,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是无法充分展开的,生产关系理论也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反过来,由于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深入具体研究的束缚,也容易造成大量生产关系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不仅对于经济科学,而且对于经济实践都是非常不利的。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2卷,81~82、82、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 12 16 《资本论》,中文1版,第1卷,200、251、1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14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241、244、26、236~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42~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 《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8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8 陈锡礼:《他山之石》,48~49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9 《世界经济》,1981(10),68页。

20 《经济学动态》,1994(4)。

(作者单位: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南京 21002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南京 210000)
(责任编辑:曾国安)